

仪陇市面货币使用情况

及金融机构的兴废

文 摘

民国时期，仪陇市面货币使用的情况是：从民初至1936年使用小钱铜元银元等硬币，从1936年至1940年由使用硬币转为使用纸币，1940年至解放前夕，纸币不断贬值，滥发的各种名目的纸币，票面额大到百、千、万倍甚至几百万倍，终于崩溃无用，买卖以物易物。金融机构的设置，实际成为官僚地主掠夺民财、中饱私囊的工具，也随着纸币的崩溃而垮台。兹凭少时的见闻和工作经历的记忆，述其梗概。

一、市面使用货币的变革

民国初年起仪陇市面使用的货币，有制钱、铜元、银元三种，到民国二十四、五年间就有纸币出现。

制钱，就是小钱，是清王朝时代铸造的货币，形状是铜质圆板，直径约二公分，圆心铸成方孔，用绳穿结成串（又名制），每串是一千个小钱。成串的小钱每百个并穿一结，五结成串。成串的钱都不是一千个实足数，要扣底子；一串钱从下向上数，第一结的两百个是九十五个作一百，名为九五钱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结，每百是九十八个，名为九八钱；所以每串钱，名义上是一千个，实际上扣了底子

后只有九百七十四个。一般零售物品以小钱文（即一个）为计算单位，批发或大宗交易以吊为计算单位。

清朝是十个皇帝以各自纪元年号造钱，但不见使用宣统年间造的钱（只有宣统元宝银元流通在市面），其余皇帝都铸有制钱流通在市面。制钱正百中央方孔上下竖铸皇帝纪元名称，左右横排铸“通宝”二字，如“康熙通宝”、“乾隆通宝”。背百铸满文，就铸的好坏说来，顺、康、雍三朝造的较好，大小厚薄相差不大，形象美观。乾隆以后造的钱，逐渐低劣，毛毛钱（板薄极小的钱）极多。市面上使用，大多是乾隆以后的小钱。光绪年间又造有一种当十文的“当十钱”，但是民国初年市面上很少使用这种当十钱。

铜元：铜元（又称铜板）每个数值是以制钱文为单位计算增大数值铸造成的，板面因面值不同而异其大小，园心无方孔，携带时以厚纸封装成吊数。

民国初年市面上流通的铜元有：（一）清光绪年间造的分两种；一种是每个值小钱十文（直径约二公分），另一种是每個值小钱二十文（直径稍大一点）。铜板正面竖铸“光绪”二字，横铸“铜币”二字；铜板下边邻弧线铸铸值小钱数目，背面铸龙形花纹。使用时，十文的每百个装一封等于制钱一吊。二十文的五十个装一封也就是小钱一吊。（二）民国初期四川军政府造的“四川铜币”，分以下几种：当小钱十文、二十文的板面，与清朝造的大小相同；五十文的要大些，一百文的又

大些，二百文的最大。四川铜币正面竖铸“四川”二字，横铸“铜币”二字，沿边上沿铸“军政府造”，下边铸数值，背面中心铸篆文“汉”字，环外铸十八个小圆圆字圆周。

二百文的铜币直径约三公分到四公分，一百文四次之，五十文的又次之。二百文的铜币正面铸“贰百文”楷书汉字，两旁禾穗，背面双旗，边沿铸“军政府造”字样。后来在民国十五、六年间又有小二百文铜元出现，形状大小与二十文铜币差不多，一面铸有阿拉伯字200文字样，另一面铸汉字“贰百文”及“军政府造”字样。

1933年至1934年间，川康苏维埃政府铸造200文、500文两种铜币，质量都好，优于旧造，板面铸有“镰刀斧头”、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等图案文字，200文一枚的与川造小二百文的大小相同，500文的要大些。

以铜币板面的优劣说来，清末民初造的要好些。光绪龙纹十文铜币，每个重量有一定标准，在民国十几年间乡间鸦片烟馆买进烟土，多以龙纹十文铜币的个数作法码，称量烟土，够不够标准秤。足见这种铜元是最标准的铜元。民国初年四川铜币二十文、五十文、一百文都较好，大二百、小二百次之；最差的字迹模糊不清，板面厚薄不一，比前不干净同小二百，是地方军阀势力加在新政权设厂铸造的。

民国初年到民国三十年左右，市面上的铜元，每个反面数值出一个小孩膨胀到几十几百倍，小孩就逐渐稀少了，民国十五、六年间，市面上就少看到小孩纹用，同有使用的，就是一个小孩作十个使用。

铜元五十文，一百文板面出现后，原五十文、二十文一个的铜元就少了；在大二百、小二百铜元出现后，原五十文、一百文的板面就少了，甚至绝了迹。当时有商人将大二百铜元劈成两个半边，抽掉中间一条铜，每个半边仍作百文使用，这样的钱叫“半夹夹”，久而久之半夹铜元和小二百铜元充斥市场，不见有双旗整个大二百铜元了。

银元。民国初年及以后使用的银元，有清朝造的板面“光绪元宝”、“宣统元宝”、“大清银元”和民国时铸造的“四川银元”（又叫川板）“袁大头”、“小头”、“帆船”、“云南半元”等板面。市面上流通较多的板面是袁大头、川板和龙儿银元。其它板面较少，这些板面的银元各有特点：清朝的板面除有龙形花纹图案外，还铸有重量库秤七钱二分，这大概是从大锭银子一个的重量改铸若干个银元分摊每个重量而来。当时人们借钱都以一锭银子折算为一十四个银元。其它板面的银元，只铸有“壹圆”的文字，没有载明重量。川板银元铸有“四川银元”文字，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像，小头银元铸有孙中山像和“开国纪念”文字，帆船银元铸有帆船图案，云南半元铸有“云南银元”“五角”字样。川陕苏维埃政府铸造的银元，背面上铸有镰刀斧头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文字和世界地图图案，市面上流通的数量不多。

市面上流通的银元，以成色来说，有的人认为民国三年造的袁大头好，含银量高，有的人认为大清银元（俗名花板）、龙形图案银元最优，妇女制首饰和手镯都选用大清龙纹银元。

使用银元，又有挡手不挡手，好用不好用之分。袁头不用“睁眼”，袁头有一种板面在眼珠内有两条竖线，就叫睁眼。川板不用“吊圈”，川板背面紫文汉字下面有条小线吊在外面小圆圈内的银元叫吊圈。川板金旁两点的银元则因四川银币的银字金旁是“全”不是“金”的原故。这些挡手的银元，据说是假币，贫困人家拿到这种挡手银元会啼哭不休，如丧考妣。

银元、铜元、小钱同时流通，莫有固定比率，银元在市场上也成商品，自由交换，银元价格时涨时落。在民国初年一个银元只兑换小钱几百个，以后大铜元出世了，一个银元要兑换值几千个小钱数目的铜元。在民国二十年以后，一个银元要兑换铜元三十吊（二百文的铜元每五个等于小钱一吊），即150个铜元兑换一个银元。

市场上的物价都是以文钱、吊钱为单位的，政府粮税却用银元计征（银元，元以下的单位有角、仙、厘都是十进位），每逢开征粮税时，银元价格就要上涨，纳税农民争相购买银元完粮税，如用铜元完粮税，征粮机关银元价格高于市价，还要遭受胥吏计算上的盘剥，把钱合成银元，银元合成钱数，在元、角、仙、厘折合上倒几个拐，完税人吃亏不少。

法币。法币是国民党政府以法令规定发行的货币（即纸币）代替金属硬币。早在民国十三、四年间，仪陇县城市面缺少小钱和小额十文铜元板面，买卖零星小物，不便找补，由县商会印制布质小额钱票，限于县城使用，但时间不久就停止了。1933年川陕苏维埃政府

发行位钱叁仟四布票币，使用过一时期；1935年红军撤离仪陇，即停止使用。1935年至1936年时重庆流通的银行券（称为地方券）的一元券、五元券，在仪陇市面上出现过，与银元同时流通，但每元只抵硬币银元九角使用。1936年仪陇乡间发放农贷、贷款，的纸币是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和五元券（人称为牛头大票），同时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（称之为中央券），亦在仪陇市面上使用，中央券与硬币银元同等价格，一元抵一元。以后每年农村信用社都放农贷，发的是纸币，市面上纸币日益增多，硬币逐渐退位。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中（中央）、中（中国）、交（交通）、农（中国农民）四银行才有发行纸币的权利，其余各银行都无发行权，四行发行的纸币称为法币。省地方银行只有发行元以下辅币的权利。四川省银行发行的红色五角辅币券也称为法币，在仪陇市面上使用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政府发行纸币漫无限制，靠发行纸币作财政收入来源。起初发行银本位纸币，后又发行关金券补充使用，关金券每元抵法币二十元，起初只有小额票面一元券、五元券、十元券；继后二十元、百元、千元、二千元、五千元相继出笼。法币的百元、千元、万元、十万元、二十万元大钞也陆续出现。市场通货膨胀，物价急速上升，终于纸币报废，商人守货不守钱，市场上形成以物易物的局面。仪陇当时的情况主要以棉花为交易媒介，称盐买米都以棉花作价。国民党政府采取改革币制措施，在1948年废银本位为金本位，发行金元券、铸造金元，规定金元券每元抵法币三百万元收回旧

法币，原来发行的法币辅币（硬 镍 币）作新币金元券的辅币用，积蓄有镍币的人又发财了，金元券的发行额仍漫无限制，不久便垮台了。又恢复了银本位废止金本位，以银元为本位币铸造帆船银元，发行银元券，当硬币银元使用。银元券每元抵金元券一百五十万元，但市面上逐渐使用硬币银元，拒收银元券，到1949年临解放时，市面上的交易完全使用硬币银元，而政府税收和地方银行收回的贷款俱是无用的纸币。

二、信用合作组织及合作金库的兴废

1936年，中国农民银行在成都设立了分行，发放农贷；农行发放农贷要通过农村合作组织转发给农民。同年成都设立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，主办农村合作贷款；省府财政厅长刘航琛兼任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，汤永夫任总干事，省合作委员会在仪陇设立指导员办事处，筹办农村合作社，仪陇办事处第一任主任指导员章泰福，指导员张友三，于当年在金城、土门、日兴、观紫、中坝、张公等乡镇组织了一批农村合作预备社，放了贷款一万多元——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，即牛头蓝色五元钞的大票和红色一元钞的小票，是仪陇大量流行钞票之始。

预备社是一年的预备期，贷款春放秋收后，即改组成立正式信用社。预备社设有社长、副社长、司库、会计和评事委员等，都是无给职。正式信用社设理事会、监事会。理事三至五人，其中一人任理事长，一人任会计，一人任司库；监事三人，其中一人任监事长。一社

的社员人数为20——50人，每户只能一人入社，社员入社缴纳股金，每股二元，最少入一股，最多不得超过二十股。讲的入社出社自愿，退社退还股金，事实上是行政命令在推动合作组织，没有人能自行退社。存款利率是存八厘，放出一分二厘，贷款付还本息后，其多收四厘的利息金额，则为社里的自由资金，作为办公费、公积金。职员由社员会选举，是义务职，没有工资，没有补贴；决算后有盈余时提给百分之十的酬劳金。好人多不愿干，狡猾者从中挪用、浮派，渔利肥己。

农民银行按其性质，只对农民放贷，农业合作社可向农行贷款，工业合作社就不能向农行贷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须要一个专为调济合作社资金的金融机构，由此产生了合作金库。四川省合作金库在1937年成立了，股本一千万元，由各县合作组织入股五百万元，农行投资五百万元。事实上四川当时只有少数县有合作社，且大都没有自筹资金，由各县合作社入股五百万元，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，只有农行投资扶持。

仪陇在1936、37年时，有一批预备社放了贷款，收回贷款后成立了一批正式社，客观上需要一个调济合作金融的机构。在1938年，由四川省合作金库投资派人筹建了仪陇县合作金库。金库第一任经理是府绍堂，以后是胡竞成、曾计轩。

合作金库的业务与银行一样，放贷、存款、汇兑、信托等。但仪陇商业不发达，无人存款；金库只对合作社放款，不作商业贷款；只

能对省内各县金库搞汇兑，业务也不多，对合作社放款，一年只春天放一次春耕贷款，秋收前放一次储押贷款。储押贷款以储押稻谷为主，秋收时谷价贱，合作社按社员需用资金，向金库申请储押贷款发给社员，社员可将要卖的谷子储存起来，由合作社封闭向金库押借，期限大约半年，渡过谷贱季节，还清贷款后，社员可以自由处理储押谷物了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通货膨胀，物价上升，严重影响平民和小职员、工人的生活，那些搞组织合作社的人员就挪用贷款搞转手买卖。到1946年以后，四川大多数县份的合作社已名存实亡，仪陇也不例外，其合作金库无形停业，由巴中县合作金库兼代仪陇合作金库业务。到1948年连仪陇合作金库的名义都不存在了。

三、仪陇县银行、四川省银行仪陇办事处的设置及其停业

1940年前后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县乡银行组织条例，规定县银行代管县一级公库事务，保管县的财政预存款，经营一般银行业务。

1942年，仪陇县县长卢响原指定大地主李甄光筹办县银行。定县银行资本为30万元，官商各半；官股由县地方公款拨充，商股由各乡镇募集，每百元为一股。仪陇素无大商巨贾，商人有点资本，也微不足道，要求商人拿出百元来入股，比登天还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筹集商股就用行政命令摊派到各乡，再由各保化整为零，挨户摊派，贫苦农民、小商小贩都不曾漏网。这就是仪陇县银行商股的来源。

县银行筹备了一年多时间，除李本人负责外，县府财政科长陈戎出了大力，到1943年9月正式成立。县银行的组成，照章程规定

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董事、监事，成立董事会、监事会。仪陇县银行没有开过股东代表大会，董事、监事的产生，是由县府内定的；李锡光担任董事会董事长，陈净植担任监事会监事长；董事会有董事15人，监事会有监事11人；董事会下设经理（系陈戎担任），副经理，再下设总务、业务、会计、出纳四组及其办事人员。

县银行除营一般银行业务外，并代办县级公库事务。仪陇县城市场萧条，商业不旺，存款、汇兑业务展不开，只有搞放贷；放贷利率是月息12%，叫做大一分二；以一月为定期，以一万元为起点；如果使用一年不还，按月息复利计算，年终本息合计需还83531元，这是很惊人的利率。县银行另一种业务就是买商业期票做生意。当时仪陇县城成了买卖南充商号的期票（又称顺票）交易市场。南充商人到苍溪元坝等地购货，不带现钞带期票，以期票支付货价。元坝等地商人又以期票带到仪陇收买土布。仪陇布商所收期票要换得现钞才能进货。当时仪陇观紫和日兴是土布集散市场，布商从日兴贩土布到观紫往返路过县城，在县城售票后以现钞到日兴买布。

顺票付款日期叫关期，每半月为一关，上半月十五日为一关，下半月月尾为一关。顺票的价格，关期近的高些，关期远的贱些，上关下关的票付票面90%的现钞，甚至80%的现钞也能买到。这要以供求关系为准。本关买本关的期票必须付95%的票面金额，也以供求关系而定。买卖期票的月利率达到20%以上，是最高的利息。

期票到关期的前三天（当时仪陇到南充不通车，步行要两天半），

须专人持票去南充提现款，如果出票人拒付现款，可将原票带回，找出售背书人付现。付息或转换下期票据。这种生意县银行作得多，可是以后货币不断贬值，售货人拒收纸币，只收硬币或以物易物，这种生意就无法进行了。而县银行收回的贷款也都成了废纸，被迫于1948年初停业垮台。

县银行从成立到停业只有五个年头，法币30万元的资本。停业时帐面上的资产只贷款一项没有收回来的有二千多万元。在法币变为金元券，金元券又变为银元券的过程中，县银行的资产，除固定资产房舍，家具外，流动资产经几折换算却一无所有了。当时李觀光任董事长，县银行成了他家的外库房。他最亲信的人作出纳管现钞，可以不通过帐务处理，就直接从出纳手里提出现钞为私人搞投机，牟取大利，他要买什么，电话通知叫出纳垫款。如果他家里现钞过多，没生意做，又没人借款，便把现钞交银行，提走银行放款的借据，由他收利息。因此，县银行停业倒闭。李无损失。

四川省银行仪陇办事处于1947年成立，营业地点在南街（现被服厂址），办事处设主任、会计、出纳三人，主任胥淑涵。省行仪办业务除营银行一般业务外兼代省库管理省税出纳事务。由于经济条件差，货币价值不稳定，没有汇兑业务，无法用汇兑的办法调进本地现金作省行仪办周转资金；又无存款业务吸收当地现金（因货币不断贬值无人愿意存款）；也不敢把库存资金投入不稳定的放款业务，致使省行仪办无业可营。故在1948年仪陇县银行停业倒闭之前就撤走了。

~ 11 ~

大 仪 山 福 音 堂

马 哲

仪陇县城西去三十多华里处，有一座山势崔巍，白云缭绕的高山，叫做大仪山，山间有一座华丽的建筑物，就是大仪山福音堂。（现是高阳小学校舍）

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迫使满清政府先后签订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，攫取了在中国“开设教堂，自由传教”、“租买田地，建造自便”等特权，向我国肆无忌惮地进行思想文化侵略，到处修建教堂。仪陇大仪山福音堂是从阆中的千佛场、阆仪交界地的唐清坝发展过来的。

大仪山福音堂，是英国一传教士于清末宣统元年来仪陇修建的。福音堂的中间有一个教堂可容二百人做礼拜，教堂两头各有偏房一间。教堂右侧一幢楼房上、下共六间，是专供英国传教士住宿、作饭和就餐之用。整个建筑面有三百多平方米。福音堂西去约两华里处建有一座四合院土墙平房，是福音堂的孤孩院。

福音堂建成后，传教士都是英国人，最早是贝永光（女）教士，随后是白金玉（女）、高云海（女）施俊科（男）教士。1933年以后是贾美玉（女）教士。传教的英国人在福音堂是至高无上的“太上皇”，有绝对权威。教堂组成人员有助士、会吏、牧师、会督等，专管传教的是牧师。这个福音堂共有教徒150余人（其中孤孩院的

孤孩90余人，邻近农民、士绅60余人），入教者有三种情况：一是被收入孤孩院的孤孩为天然教徒，其实他们是被强迫带上了“洋教枷锁”的；二是受教义宣传，欲求摆脱被剥削、被压迫之苦，望上帝赐福而入教的农民；三是企图借洋教势力，巩固他们的封建地位的士绅。教徒有听友、教友之分；听友只参加做礼拜，听圣经而已，教友可以领圣餐，吃耶稣茶点，学习教义并宣传教义。凡参加做礼拜的教徒，每次都要献款（多少自便）以表示祈福。

大仪山福音堂信奉耶稣教，把创教的耶稣称为救世主，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为拯救世人，才降生人间，信了基督教可以免罪过，可以上天堂。要教徒做到“仇人杀了你，也要爱他，如遇仇人睡着了，你必须把他叫醒，不可杀他”。这些宣传的实际用心是麻痹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意志，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。

日本帝国主义者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强占了我国东北领土，1937年又发动“七七事变”妄图灭亡我国。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战，誓驱倭寇，光复失地的时候，英国传教士贾美玉公开向教徒们讲：“你们中国人没出息，自己办事办不好，该交给日本人管。你们中国人打不赢，长期打下去，死人花钱划不来，交给日本人管，还要好些，当亡国奴，还少受罪。”公然叫国中人民不抵抗，甘当亡国奴。

福音堂的孤孩院是福音堂办的慈善事业”。由牧师徐亚光任孤孩院的管理员。1929年英国传教士在大仪山买了150挑田地，除出租100挑外，其余的由长工和孤孩耕种。进院的孤孩都必须更名，

每个名字冠以“恩”字，如肖志新更名为“肖依恩”，廖其珍更名为“廖其恩”。意思就是耶稣对孤孩施了恩，孤孩应报耶稣的恩。其实孤孩一日三餐，每餐两碗都是稀饭，筷子挑不起，只能用口喝。每个孩子一年发给一套土布单衣，一双布鞋，数九寒天，手脚冻坏，化脓流水无人过问。孤孩一年到头从早到晚干活拾柴，要受院的管理员监督检查，稍不中意就吃不成饭还遭毒打。孤孩廖其恩入院第二天就上山拾柴，中午回来牧师徐亚光用脚在背兜往下一踩，有个窝坑，就骂她是懒虫，硬不准给饭吃。一个冬天的早上，风雪交加，寒气逼人，廖其恩没有拾到柴，徐亚光不但不给饭吃，还狠狠地毒打了她一顿。1940年时，廖其恩出麻子刚三天，徐亚光就强迫她出坡做活，廖其恩头痛得很，站起来又倒下去，倒下去又拉起来，仍得去，以后病倒了三次，她受尽熬煎和折磨，好不容易才活出来。

传教士英国人贾美玉独揽着传教和经济大权，在福音堂还办有牛奶场、磨房、磨房、碾房、医疗室、浴室、马房、客厅等，并把150挑田地的收入主要供其私人挥霍。她的生活和孤孩相比，真有天堂地狱之别。当时大仪山流传着“洋人一顿饭，穷人吃半年，天天鸡鱼面，无荤不摆饭”的顺口溜。早点，奶油、蛋糕；早餐、午餐，三菜一汤；晚餐，面条、蛋糕；间天一次肉烧饼或糖烧饼。她雇了一个外当家，专司采买，一个内当家，专管伙食，一个厨师专搞烹调。还挑选了三名较大的孤孩为她洗衣、打柴；另外还定雇了当地农民何正文，吴光华专为她抬滑竿，外出往返途中遇陡坡，山路从不下让一步。她一个就有八

个中国人虐待。贾美玉还把出租的田地定为铁板租，不管天旱水涝，租子颗粒不少。如：1944年孤孩院的廖其思与当地一个农民结了婚，向孤孩院租种田地15挑，要求庄粮收入四六分成（即佃户得四成，田主得六成），贾硬要廖写成租约，每年交水租五石，旱租一石。夏季把旱租交齐了，秋后因灾歉收，要求减少水租，贾美玉便亲自到廖家翻箱倒柜，柴草堆里都搜查了一遍，见实在没有，则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们自己吃了，不能怪田地不出，稻谷不交齐，就用杂粮补足，以后没得吃的，不要再上院里来。”廖其思气愤的骂道：“一步跳出鬼门关，永世不往回头看。”俗话说：“斋公心，门兜钉，有好长钉好深。”贾美玉比这样的“斋公”还凶狠毒辣。

徐亚光是达县人，于1934年来大仪山福音堂作牧师，专管传教。后来任孤孩院的管理员，他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尤其恶劣的是，他借管理工作之便，威胁利诱，要尽流氓手段，侮辱女孩，长期奸污钟××、姚××等，使她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平时院内女孩子不敢单独同徐亚光见面，怕受凌辱。一次徐亚光拉着一个盲女的头发，上前拥抱，那个盲女敢怒而不敢言，极力挣脱，可徐死死抱着不放，另一个盲女胡××恨其狂暴，低声骂了一句“老不要脸！”徐不仅用棍子毒打胡××，还罚胡打扫院坝，胡无法扫干净，徐强迫她重扫三次，并恶狠狠地喝斥：“看不见就用手摸，扫不干净不准吃饭。”又一次，徐亚光企图侮辱女孩马××，马不从，徐寻故将她毒打，几成残废。徐就这样蹂躏女孩，为所欲为，令人发指。同时徐还以送孤孩杨

××去阆中读书为名，拐骗到他家做了他的儿媳妇。徐以外，还有更残暴的牧师梁启东、教徒冯光南等，他们以基督教徒为护身符，称霸一方，对内奸淫估霸，对外包揽词讼，鱼肉人民，坏事做尽，人心丧绝，这就是当时福音堂办的所谓“慈善事业”。

综上所述，英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来华传教，实为侵犯我主权，奴役我人民，霸占我土地，掠夺我财物，罪责累累，铁证如山，加上民族败类为虎作伥，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，在1933年红军驻仪时，大仪山福音堂的凶恶残暴的牧师梁启东，则被革命人民所镇压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，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、汉奸、走狗的威风。

1949年仪陇获得解放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，人民翻身站起来了，英国传教士贾美玉被遣送回国。大仪山福音堂田地房屋分给劳动人民，受苦的孤儿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，各得其所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成了新中国的主人，他们回顾往昔而激动地说：“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给我们带来了福音。”

方州夜月（仪陇八景之五）

李 蛟 主文

矗立在仪陇县城后面的金城山，四面岩壁如削，方正如屏，象一枚御璽的印信，历史上人们称它为“方城山”。

唐高祖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在金城山上设州治为“方州，”

当时州治与县治在一地。《寰宇记》中载：仪陇县城原在金城山顶，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38年）移于山腰，即今地也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朝代变迁，后人遂将仪陇古城所在地的金城山，称之为“古方州”。

仪陇老县志对仪陇城有过这样一番扼要的描述：仪陇依金城之峭壁，临鳌洞之悬岩，东西一道中通，南北二关险绝，层山叠绕，溪水环流。这仅对仪陇城的地势、街衢，城郭作了一个概括的勾勒，但远远不能括揽仪陇城依山临鳌的瑰丽景色和沿寨筑成的自然风光。

金城山有许多天生的奇洞怪石，历代劳动人民又在山中修建了不少寺庙官观、楼阁亭榭，把壮丽的古方州装点得更加妖绕多姿。东西南北四道寨门悬岩百仞，十分险要，只南寨门有一便道直通山顶。山的四周陡岩峭壁中，有几个光怪陆离的岩洞，东有朝阳洞，西有佛龙洞，过去两洞门外，都倚山傍岩修建了庙宇佛堂。在“左”的影响下，一九五八年时，庙堂古迹被拆毁，只天生的两个岩洞依旧宛然并存。据人们传说，古时候有一个探求奥秘的人，要试验一下民间流传的“朝阳佛龙两相通，仙子修道在其中”的真伪，便找来一只大花猫，让它从朝阳洞口而入，不多时，果然猫自佛龙洞内缓缓走出，从此证明两洞确实相通。金城山西南边的抱朴洞，相传为晋代抱朴子郭洪炼制金丹的地方。“抱朴洞”三个斗大的朱红楷字，呈现在洞门外，甚为注目。离洞不足二十步远的山嘴悬岩处，清代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1686年）修造了一幢为纪念西蜀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结义的“三义阁”。阁高数十尺，上下共三层，宝鼎式飞檐纯木结构建筑，极